

● 书 评

# 文化权力与外交解读

## ——读《德国对外文化政策》

叶 隽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作者简介] 叶 隽(1973-), 男, 江苏南京人, 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主要从事留学教育、中德文化与国际关系研究。

[中图分类号] K516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639-02

由于自身职业的原因,我感觉到在中德教育文化交流甚为繁荣的背后,有一根隐线的作用不可忽视,这就是德国政府的对外文化政策导向。1999年,我到德国几个对外文化中介机构去实习访问,就发觉德国人的政策理念实在轻视不得,而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其对外文化政策。由此颇感兴趣,并自己动手做了一些初步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但终究是浅尝辄止,没有精力去追根究底;但毕竟心中滋滋在念,因为已经隐然意识到,中国的大国崛起的民族梦之实现,与此可能大有关系。所以到大英图书馆查找资料,也颇关心对外文化政策方面的东西,可惜,所查到的资料无几,看到目录上有一本《对外文化政策》(*Foreign Cultural Policy*)甚为惊喜,待取到书时,却原来还是德国的东西,副题为“从德国观点的阐释”(A Survey from a German Point of View),出版于1979年的伦敦,作者竟然是德国人 Hans Arnold,此书亦自德文翻译而来,原题为《作为政策的文化输出》(*Kulturexport als Politik*),由此,自然可见“对外文化政策”作为一种概念的鲜明的德国特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为以日耳曼学为专业的学人,姜锋博士接近这样的研究专题,其实是再恰当不过。虽然,研究国际政治的学者也同样会对这样的题目表示出兴趣,但那种专业上的关注,与对一种文化的亲近和了解后,再产生的探询的眼光,并不可完全同日而语。或许,也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作者才选择了这样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题目吧!

全文分为七章,第二章介绍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历史发展与影响,基本上按照历史沿革顺序,从20世纪早期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历史渊源讲起,直到两德统一后的情况,都做了基本的资料梳理和史实厘清;第三章探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外文化政策的结构和执行者,对德国外交部及其文化教育司、中介机构都分别作了介绍,同时也从内涵的角度突出了“科研与高校”、“德语语言资助”、“外国学校”;第四章强调的是作为权力政策的对外文化政策,从国际政治的大背景切入,探讨“权力”政治在国际舞台中的核心地位,而文化政策作为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能例外,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软性权力”,更有其特别重要的地位;第五章探讨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外在形式及其重心所在,区分“宣传”、“文化推广”、“自我介绍”等概念的差别;第六章则颇具时下意识,题为“全球化背景下的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作为权力资源的教育科研居留地”,德国近年来特别重视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其教育科研的宣传,不遗余力推动其高等教育国际化,吸引留学生和学者去德国,表现出一种“与时俱进”的姿态和信心。作者对此把握相当准确,并对此作出自己的分析与判断,应该说是相当敏锐的。

作为外交政治的一个重要范畴,德国的对外文化政策一直是非常值得探索的题目。德国外交政策有三根重要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对外文化政策,其他二者分别是对外政治和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必须清楚地指出,对外文化政策从来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它总是和德国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相连。在我看来,这篇论文的重要意义有三:

其一,对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历史做了系统性地梳理。以对外文化政策,即把文化作为外交的核心部分之一,来实现本国的战略利益。在这一领域,国人素来重视不够,纳入外来视野,尤其是对外文化政策的始作俑者德国,对中国未来

政策之发展,意义重大。因为德国对外文化政策历史悠久而独具特色,是现代德国崛起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因素。我最看重的是作者对这一历史过程的梳理。在作者看来:广义的德国文化作为德国的软权力是德国文化外交的基础,德国文化外交政策也同样是德国整体对外关系中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政策,但在不同时期带有不同的、深刻的时代烙印。从第二帝国“世界政策”时代文化外交政策即初露端倪,由于 20 世纪初两次摩洛哥危机使德国人意识到仅靠强硬的外交和军事手段无法实现其成为世界强国的梦想,从而开始重视“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一战的失败,不但使德国沦为任人宰割的战败国,更使其军事和经济实力损失殆尽,在国际舞台上处于极其被动状态。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德国文化实力的留存,使得魏玛共和国时期“文化外交”得以兴起,凡所列举,德国未来的重要文化外交机构如外交部文化司、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洪堡基金会、歌德学院等在此期得以成立,政治上软弱无为的魏玛时代,恰恰成为“德国文化外交政策大发展的时期”,对内稳定统一,对外参与竞争。“文化”原来竟还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希特勒时期,更是把文化外交作为推行强权和法西斯侵略外交的工具。作者将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发展,概括为从“再造德国文化民族国家形象”、“作为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参与维护世界和平”到“外交政策全球化,全球范围内促进人权和民主价值”,应该说基本上把握了德国外交政策和对外文化政策的精髓,并直指德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国家利益”本质。“史实”梳理之外,能有这样的“史识”,颇为难能。

其二,引入国际政治理论关于“权力”的新概念,尝试在传统的国家权力(英文 power, 德文 Macht)之外区分“硬权力”(hard power)与“软权力”(soft power),并将“软权力”与德国政府 1970 年后确立的“广义的文化概念”(erweiterer Kulturbegriff)进行勾兑,基本在理论上形成了相对自治的体系。作者在结论中提出:“在国际政治中文化其实始终是一个权力要素,而在德国对外文化政策中则一直作为一种权力工具被有意识地予以贯彻。随着国际体系相互渗透的增长及全球化的深化,文化作为一种权力手段正如同硬性权力一样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联邦德国及其对外文化政策自然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所以,他进而大胆推论:“德国对外文化政策其实不仅是‘第三支柱’,而更是德国对外政策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但应更注重对于科学的重视程度。”以此收尾,不难看出作者对这一经过长期探索的研究课题的基本结论,既极大地肯定了德国对外文化政策的重要作用,也不无深思地指出了其“软肋”所在。尽管德国人其实非常重视其“科研”,但在对外文化政策中更将诸如推广德语、吸引留学生作为优先考虑的对象。

其三,资料收集丰富,为国内在本领域研究做了奠基的工作。作者用近 6 年的时间完成的这篇博士论文,厚达 200 余页,征引资料文献颇为丰富,长达 12 页的文献目录,就足以证明作者在资料收集上所下的苦功夫。我觉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大量的二手文献和研究著作之外,作者在德国所查阅的档案资料,诸如联邦议院和联邦外交部的档案;进行的大量当事人访谈,如与德国学术交流中心秘书长、副秘书长、中国处长、驻北京办事处主任、外交部前文化司司长、波恩大学德国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等,都是非常可贵的。对于一个学者来说,除了书本资料之外,进行这样一种兼有“质的研究”的尝试,对于文章的立论、思路的成型,别有一种意义。作为一个进行德国研究的中国学者,能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当然,此文亦非完璧无瑕,整体而言,史实性的梳理多,理论层面上的分析少,国际性的比较视野亦稍欠缺;至于我私人所期盼的对于中国等发展中的、待崛起的大国的启示更几乎没有。但其对于文化与外交关系的探讨,尤其以德国为个案,毕竟是开前人所未发(就国人研究而言)。就文化与外交的关系而言,其实国内学人已经开始注意。冷战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试图以其文化价值观来重塑世界;而在当代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由于其经济实力与科技领先,更对其传播美国文化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国家甚至强烈地认为:“全球化基本上是美国经济惯例和理想向世界的延伸,是美国履行其权力的一种工具。”美国对外文化政策自然是另一个值得研究的题目,但就从文化多元、反对霸权的角度而言,对德国对外文化政策进行系统的研究和思考,显然亦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责任编辑 吴友法 涂文迁)